

继续审判:解读《审判材料》(上) ◆ 陆其国

《审判材料》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罪证

这本书到我手上时,硬纸封面已有磨损,书名繁体字迹褪色严重;内页纸张也已泛黄,但不缺页;全书共583页,封面下端有“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字样。里面扉页几乎就是封面的复制;全书没有版权页,没有印数,也没有定价,只是在扉页背面注明:“本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系按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刊印原版译出。”由此看来,这本《审判材料》应该属于非公开出版的内部资料。

《审判材料》详细记录了1949年12月,在前苏联伯力城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和判决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尾家隆二、第731细菌部队生产部长少将川岛清等12名战犯的全过程;披露了日本细菌战部队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的滔天罪恶。此间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的,分别是前苏联少将法官契尔科夫特夫与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担任国家公诉人的,是前苏联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各被告均有律师作辩护人。

《审判材料》一书由序言、预审文件(包括起诉书、被告与证人供词、文件证据)、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包括各被告、各证人受审经过)、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演词(包括各被告最后陈述)、军事法庭判决书等组成。由此可见,《审判材料》是一份极具分量

《审判材料》是笔者早先在上海旧书铺淘到的一本旧书,这本书的全称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详尽地记载了日军细菌战部队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诸多细节。



和档案属性的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罪证。其中“起诉书”指出:“帝国主义日本的当权集团,同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一起结成罪恶阴谋联盟,曾策划、发动并进行侵略战争反对各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以期和希特勒德国共同建立世界统治。”“这些侵略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即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国家。此种力求用强力掠夺日本邻近诸爱好和平国家广大领土以期建立这样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事实,也就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者怀有极端强烈的扩张意图。”

“起诉书”还提到,“本案预审结果业已查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策划和准备其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时,为达到其目的,曾立意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歼灭人命的罪恶工具。”接下来,“起诉书”就列数日军建立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详细经过。“预审结果查明,在占领满洲后不久,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陆军省就在满洲境内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并将其划归日本关东军建制内。该实验所系由日本著名细菌战思想家,以后晋升为

军医中将的石井四郎主持。实验所中专门研究用烈性传染病菌进行攻势细菌战方法。”

对此,前日军军医少将,此次被审判的12名被告之一川岛清供述:自1935至1936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活动”。这两支秘密部队,一个就是以石井实验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另一个是“关东军兽疫预防部”。1941年,“当希特勒德国开始进犯苏联后,这两个机关就用番号秘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〇〇部队’”。前者由石井四郎领导,后者由兽医少将若松主持。这两支部队都配有细菌学专家;工作人员中许多是由日本最著名细菌学家指导的科学技术人员。其中臭名昭著的第731部队就有成员3000人,细菌战部队的巨大规模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日本统帅部则拨巨款提供给这两支部队制造细菌战武器。

“起诉书”还提到,“为了展开七三一部队的活动,特于一九三九年间在距离哈尔滨二十公里远的平房站一带,建成了一座大军用市镇,其

中设有许多实验室和办公室,储存有大量原料品。市镇周围划定了一个禁区,以资严守秘密。预审材料证实,731部队第一部专为进行细菌战来研究和培养鼠疫菌、霍乱菌、坏疽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及其他病菌,以便在细菌战中使用。该部队还有自己的航空队,并在安达车站附近设立有一个特种打靶场”。安达车站这个在中国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的地方,却证据确凿地留下了日军细菌战部队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正是在这里,日军细菌战部队拿中国老百姓活体进行罪恶的炭疽实验。我们也许还记得十多年前一度令美国民众人心惶惶的“炭疽邮包”事件,当时美国不少政府部门曾收到恐怖分子寄达的带有炭疽粉末的邮包,一时间“炭疽”病毒名传天下,令人闻之色变。从网上得知,日本细菌战部队很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早研制炭疽病毒的,那时的炭疽称为“第一代”,现在则已超过“第八代”了。据《审判材料》中12名被告之一,曾担任第731部队驻吴城第673支队长 的西俊英供述,他曾遵照第731部队的命令,“特于1945年1月间到离哈尔滨146公里的安达站去过。我在那里亲眼看见过在第二部部长嵯常重及科学工作员二木两人指导下进行传染炭疽症细菌实验的情况。当时10名犯人都被绑在木柱上,头部用铁帽盖住,躯体用铁板盖住,只有臀部是光着的。在约100公尺远的地方,用电流把一颗破弹片炸裂去实行传染。所有这10个人光着的部分都受了伤。实验结束后,这10个人被装到一辆特备汽车上送回监狱。以后我曾向嵯常重和二木问及实验结果,他们回答说,这10个人

都因染上炭疽症而死掉了”。

12名被告之一,原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供述,日军使用细菌武器,主要有通过飞机散布细菌、投掷细菌弹,以及进行军事破坏几种途径。他们在前线和敌后大量散布染有鼠疫、霍乱、伤寒、鼻疽、炭疽热及其他烈性传染病的致命细菌,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传染到居民区、蓄水池、水井、庄稼地和牲畜群,目的就是想借以造成瘟疫,让千百万人死亡。在施行这样的罪恶时,他们丝毫不会去顾及,如此暴虐的行径,不仅对交战国居民,即使是对中立国,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更残忍的是,为了检验细菌武器杀生作用究竟如何,日军细菌战部队还有系统地和大规模地用活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预审材料证实,日军细菌战部队拿活人来做罪恶的实验,最后将这些人残酷杀害,都是经过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认可并同意的。对此山田乙三自己也承认并作如下供述:“我……曾准许人们去进行此种实验,因而我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队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受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

而作为证人受讯的古都,在供述所实施的罪恶时,讲得更为具体:“……大约在一九四三年初,我奉第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长官田部井命令,初次参加对该部队监狱犯人做传染伤寒病的实验。我预先准备了一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五十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所记得的,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第一章 音容(连载2)

肖劲光大将:多才多艺,善跳水兵舞

肖劲光将军善水兵舞。红军时期,将军常于晚会上身戎装,登台表演苏联水兵舞:漫步舒臂,旋转腾越,皮鞋“嘎嘎”,四座寂然,至精彩处观众击掌之和。是时将军甫由苏联回国,任职红军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

肖劲光将军多才多艺,擅长洞箫、二胡,亦能弹曼陀铃。将军以洞箫吹《春江花月夜》《苏武牧羊》《满江红》,以二胡拉《浏阳河》《信天游》,以曼陀铃弹《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最为拿手。长征途中,将军偕一管洞箫前行,常于人困马乏之际吹奏,官兵听之悦闻仙乐。

张云逸大将:身材短小,气度宏深,喜长袍蓄须

张云逸将军不抽烟,不喝酒,无嗜好,喜恒端坐一室,戴老花眼镜,镇日读书,批阅文件无怠容。凡有所思所想所感,以派克笔或小楷毛笔疾书如飞。

罗瑞卿大将:毛泽东戏呼“罗长子”

罗瑞卿将军个高腿长,耳圆鼻直,双瞳炯炯。与人聚,如鹤立鸡群,尤为突出,毛泽东尝戏呼“罗长子”。

王树声大将:敦实剽悍,双唇前突,脸上酒刺如麻

王树声将军敦实剽悍,胡须从密,双唇前突,脸上酒刺如麻。钱钧将军告余红军时期初见王树声将军印象:坐草地脱衣捉虱子,虎背熊腰,浑身横肉,如怒目金刚,无人敢近前也。杜义德将军告余,西路军失败后,与王树声将军一席乞讨寻生,其时虽手无寸铁,衣衫褴褛,人见王皆大惧。故每至一地,必由杜义德将军前行,好言慰慰,而王树声将军则不得不低首藏之后。

许光达大将:为人谨厚,言貌温和,待上下左右尚有礼

许光达将军为人谨厚,言貌温和,待上下左右尚有礼。将军小名许德华,曾用名许泛舟、许洛华。1929年10月以中央代表身份,



被委派洪湖革命根据地,改名许光达,时任红六军十七师师长。

王震上将:喜蓄胡,以“王胡子”自称

王震将军瘦长挺拔,白发后掠,直鼻梁,厚嘴唇,大嘴巴。将军耿介为人,纯真为怀,怒则咧咧齿突如金刚,乐亦咧咧齿突似孩童。尤喜着深灰色中山装,任国家副主席仍如是。

王震将军凡受领任务,必蓄胡留须,不达之不净面。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戏呼为“王胡子”。

邓华上将:身材修长,面孔白皙,武官文相也

邓华将军身材修长,面孔白皙,武官文相也。然治军极严,训人如雷霆震荡,暴雨倾盆,加之将军下颚负伤,出言嘴歪斜,若咬牙切齿状,人皆惧之。

邓华将军,原名多华,字实秋,湖南郴县人。祖辈三代书香,幼好古学,博览群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诸书,目所见辄终记不忘。与群儿戏,常以扁担作长矛,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

著名作家周而复于《晋察冀日报》撰文《邓华断片》。文曰,邓华司令员文静且勇敢,严肃且活泼,冷峻且热情,沉着且坚韧。

湖南省军区原司令员蒋金流于东北初识邓华。是日,邓华将军乘一马车于雪原中“喀喀”而至。将军立于车上,头戴狐狸帽,身披毛领风衣,面孔慈祥,风度斯文。马车上火盆,一酒坛,一手摇留声机。留声机,专为听京剧唱片用也。邓华将军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司令员。

叶飞上将:理分头,戴眼镜,身材颀长,眉目清秀

叶飞将军虽书生模样,然举止果毅,智勇过人,及老体微胖,额高面宽,更显霸气纵横。

1938年1月,叶飞将军由闽下山至福州,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事。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于省政府会见叶飞。陈仪仔细打量,惊讶曰:“你就是叶飞?!”将军答:“是呀。”陈仪情不自禁曰:“你是个书生嘛!”当晚,陈仪设宴招待。叶飞将军特意着缴获国民党军保安旅旅长毛料军服,昂然入席,目不旁视,国民党军方面如保安司令等人虽不悦,亦难言。

5.蒋家巷中的高级石库门

我的小时朋友俞宏根告诉我,还有一条玉皇山弄堂,却位于昌平路对面的一条弄堂,是属于对面洗衣作坊那一条,也就是我的插兄朋友王经强家住的那一条。为什么玉皇山庙建在蒋家巷,而这个名字却穿越到对面的弄堂里去了,我就知道了。

居委会的旁边是一个咸菜作,曾经做过专门腌制咸菜的作坊。我曾经在经过的时候好奇地走进去看工人们做咸菜。只见一个个粗壮汉子在巨大的咸菜缸上赤着脚踏踩咸菜,还用手拉着吊绳,有点像今天按摩中的一种“踩背”。从此我有的时候吃咸菜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双双这样的脚。

走过这条小弄堂,出现了一幢很大很气派的房子,可以说是蒋家巷中的高级石库门。居民都从后门进出。前门则都开着一溜的店。第一家是老酒店。这是一家具有很悠久历史的酒店。店主姓吴,跟我爸爸同姓,而我爸爸是一个嗜酒的人,他在外公的封建势力强压之下,心情是郁闷的,常常借酒浇愁。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连饭都吃不饱,还来喝酒。而这位吴姓酒店老板,还为我常常私留了酒,倒在我爸爸的茶壶里,他端然在酒店里坐着,人以为他是在喝茶,实际上却在慢悠悠地评尝杯中物。我小时候帮爸爸去拷酒的时候,到这家酒店,吴老板和他酒店的食客总是会指着我说,这就是老板的奶末头儿子,宝贝儿子。

酒店隔壁是一个老虎灶。老虎灶的灶是平的,几个水锅轮流烧着开水,伙计则用着一把紫铜制的漏斗套在热水瓶中,用铜勺子往平锅中舀水,再灌到热水瓶中。整个老虎灶中总是热气腾腾,云蒸雾绕,很有摄影师镜头前的美学效果。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常常喜欢去老虎灶泡水,看着紫铜漏斗和铜勺打开水,非常气派和过瘾。后来改成了水龙头的老虎灶,那种感觉就没有了。老虎灶的后面是一个黑黑的大房间,以前我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只看到有人进出,都是彪悍的肌肉。大了以后才知道是一个简易的浴室。踩三轮的、拉老虎塌车的、磨豆腐的各种行业人等,下了班之后,花几毛钱打些开水

就在后面用一个木桶冲冲,算作洗了澡。

老虎灶隔壁是国营的米店、酱油店、酱菜店。这三个店合在一起,明显要盖过任何个体户的小店。国营店的隔壁是私人的一个炒货和酱菜店。过了酱菜店又是一条横弄堂,以前有过一条水沟,后来填埋之后,成为石子小路,穿向江宁路出口,我的小学同学陶华卿等人就住在这条支弄里。

支弄的角上是一间当铺。我记事的时候已经没有大大的“当”字了,从外观上也看不出。我曾经到过江苏昆山千灯镇的老式当铺,当铺的柜台高过头灯,就像鲁迅描写过的那样。这里的当铺却是延续民国时代的,在新社会建立之后有过一段短暂的时期营业,后来称作调剂商店,我进去过。没有那么高的柜台,接待的人也和气很多,多是一些小户人家应急的时候,把家中临时不需要的东西拿出来当些钱。我记得我妈妈在我父亲死了之后,有的时候也往那里跑,将平时不急用的金银首饰、皮衣皮袄往里送。当年父亲做生意写字用的都是派克金笔,也可以当,那当票我还都见过。甚至有一次还帮妈妈去将当铺里的东西赎出来。

当铺的楼上是蒋家巷的大户人家,不记得是哪个大姓了。或许就是蒋姓吧。因为蒋家巷的得名就是这里最早住的是蒋家。那房子是青砖红瓦,严严实实。据说是蒋家巷最有钱的人家。我们小孩平时都不知道住些什么人。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那里住的一夜间变成了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甚至把他们指为所谓的“流氓阿飞”。要抄家,要破四旧。他们为人都非常和气,平常无非是穿着海外进口的小裤脚管,尖头皮鞋,或吹着大包头,花衬衫,估计都是有海外关系的资本家子女。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有家女儿从弄堂口走进来,提着一双尖头皮鞋,穿着丝袜,推着一辆自行车往青砖红瓦的家中走去。显见是在外面被人“革命”了。

沿着这条路走向支弄的深处可以通往江宁路的开口,接下去就会来到小河边,那是一条小小的臭水沟,到了我20多岁的时候,这条河浜就填平了。

消失的蒋家巷

吴琦幸

